



阎宗临传

阎守诚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SENATUS POPULIQUE FRIBURGENSIS

LIBRARY OF THE SENATUS POPULIQUE FRIBURGENSIS

LETTERARUM LICENTIATI

YIAN TSOUAN LIN
DOCTEUR EN LETTRES

阎宗临传

ESSAI SUR LE P.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阎守诚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阎宗临传 / 阎守诚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57-0898-1

I. ①阎… II. ①阎… III. ①阎宗临—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0544 号

阎宗临传

著 者: 阎守诚

责任编辑: 张继红

助理编辑: 董润泽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98-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父亲的传奇人生	1
1	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	2
2	《阎宗临史学文集》	3
3	《阎宗临作品》	9
二	从山村到北京	17
1	走出山村	17
2	与高长虹、鲁迅的交往	27
三	欧洲勤工俭学	36
1	法国做工	36
2	在瑞士弗里堡大学	42

四	罗曼·罗兰的关爱	54
1	姐姐的回忆	55
2	罗曼·罗兰如是说	62
3	访问罗曼·罗兰的故乡	67
五	东归一年	72
1	回到山村	72
2	在北平中法大学	77
3	我的母亲与二姨	84
六	博士论文及其他	90
1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90
2	清初的中西交通	105
七	父母共赴国难	113
1	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祝福	113
2	弗里堡印象	120
3	回国：从太原到武汉	128
八	在桂林的岁月	137
1	艰难的生活	137
2	旧友新交	145
3	与梁漱溟、向培良为邻	151
九	抗战与文化	159
1	近代欧洲文化与战争	160
2	欧洲文化的历史与未来	171

十 逃难寻踪	182
1 在蒙山	183
2 复课文尔村	188
3 到昭平去	197
十一 广州风云	204
1 在中山大学	204
2 欧洲的历史	219
3 回归故乡	233
十二 在山西大学	241
1 情系教师	242
2 《谈独立思考》	251
十三 史学之难	257
1 西北史地	257
2 艰难之路	267
十四 在政治运动中	279
1 思想的变化	279
2 在“文革”中的遭遇	297
3 父亲逝世之后	315
十五 我的兄弟姐妹	329
1 兄弟姐妹	330
2 父母的教育	343
十六 我与父亲	349

后记	362
附录一：阎宗临年谱	366
附录二：阎宗临研究资料	373

一 父亲的传奇人生

我的父亲阎宗临逝世于 1978 年 10 月 5 日,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萦回脑际,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慈祥的。他待人和蔼而宽厚,处事正直而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在家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遇到问题,总是像对待朋友那样平等地和我们对话谈心。我们家的气氛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特别是每逢寒、暑假,父亲稍有闲暇,我们全家总爱聚在一起,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到生活,天南海北的神聊。父亲自然是中心人物,他那充满智慧与哲理的谈话,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教诲。这样充满情趣的家庭聚会,而今已是遥远的往事,然而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温馨记忆。

父亲一生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专长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中西交通史。父亲逝世后,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来承担,因为我们兄弟姐妹 6 人,只有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他们都是学理科的。我在史学领域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父亲的专业世界史了解并不多。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父亲这些论著的价值,但我知道它是有价值的,更何况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以及这些论著保留下来的艰难。我想,如果再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因此,我也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版,作为一种对父亲的纪念吧!也就

是在这些年整理、出版父亲遗著的过程中，使我逐渐对作为教师和学者的父亲，除了他的慈祥之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看似平淡的人生，实际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 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

父亲的人生传奇可以从一只小小的手提箱说起。这是一只 1937 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手提箱，大概是父亲在欧洲读书时放书籍、笔记本和文具用的。这个小手提箱质地并不好，不是真皮的，而是纸皮的，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已经很陈旧了。我小时候见到这只褐色的手提箱，是放在父亲的床下，箱子里面装着父亲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以及没有发表的论著手稿。这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能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它们起码经过两次大的劫难：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 年日寇侵入广西，桂林形势紧张，我们全家随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从平乐到荔浦，再到蒙山，在从蒙山转移到昭平仙回村时，遇到日军抢劫，我们仓促上山躲避，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 7 口人，只留下一条被子。在逃难期间，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多么艰难，父亲手里总提着这只小箱子，箱子和里面的东西总算没有丢，保存下来了。

再一次是“文革”期间。父亲在山西大学，1966 年 8 月 21 日，造反派来抄家，把这只小箱子里面的东西（除父亲过去发表的著作、论文外，还有两包信件，里面有李四光、熊十力等人的信）当“黑材料”一起抄走。当时，我还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离校，回到家里，母亲说：“你一定想办法把爸爸写的东西找回来，这些东西丢了，他人都变呆了。”我看父亲也的确是神情大变，双目痴呆而迷茫，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以学术为生命。于是，我先打听到来抄家的组织是生物系的“红山大”战斗队，然后去找父亲的学生、我的哲学老师梁鸿飞说这件事，因为“文革”开始后，梁老师一直对父亲很好，晚上常来家里看望父亲，或者陪父亲出去看大字报，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梁老师说：“正好我们楼里住着一位生物系的老师，我去找他看是否有办法。”过了几天，梁老师让我到那位生物系老师宿舍取父亲的东西。这样，在 31 日，也就是抄家之后的第十天，我去把父亲的“黑材料”取回来。

其中,父亲写的小说《大雾》和散文集《波动》、《夜烟》以及《南王村史》、信件等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概那些造反派学生觉得文学作品比史学论著好看,就扣下了。现在回想起来,梁老师和那位生物系的老师出手帮助找回了父亲视为“生命”的东西,这对父亲是极大安慰,也为我后来编三卷本的《阎宗临作品》保留了基本的材料,使父亲的学术成果能够流传于世。写到这里,我应该向梁老师和生物系那位老师在危难之中的帮助,表达深深的谢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我开始编辑父亲的文集,并且和山西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的情况是学术著作出版难,个人论文集出版尤其难,难就难在出版的资助经费上,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大的关心和支持下,三晋文化研究会将父亲的文集列入《三晋文化丛书》给予了大部分资助,我们自己也出了一小部分经费,终于可以出版。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阎宗临史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30万字左右。我从父亲的遗著(包括未发表的手稿)中进行选编。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是父亲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这是父亲的主要专业;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包括《身见录》、《西使记》、《北使记》和《佛国记》,这四部古文献的作者都是山西人,因此,可以作为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以此表达父亲热爱故乡的一片拳拳之情。

从1993年开始编辑和联系父亲《文集》的出版,一直到1998年才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文集》,期间经过了将近5年,《文集》出版时恰逢父亲逝世20周年。

2 《阎宗临史学文集》

按照常理,出版《文集》总要请个适当的人写序言,当时,父亲的朋友大都已逝世了,我想到了饶宗颐先生。饶先生和父亲是抗战时在无锡国专的同事,1944年又一起逃难到蒙山等地。1977年初,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去拜访过饶先生。于是,我给饶先生写了封信,禀告了父亲的《文集》即将出版,想请他写篇序言。恰好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先生要去饶先生那里,我就请他把信



《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带去。

我在编辑父亲的文集时，曾将父亲的部分文稿请荣新江审阅，他给予很好的评价。父亲的手稿《大月氏西移与贵霜王国的建立》就是新江推荐到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第十三卷发表的。新江在这篇文章前还写了一篇《按语》，介绍了父亲的履历和学术贡献，在《按语》结束时，新江写道：

阎宗临先生是位刻苦勤奋的史家、爱国的学者。他对中国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应当是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但世道艰难，日本侵华战争毁掉了他在欧洲的学术积累。然而，他在世界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上仍然有所建树，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今特发表先生五十年前的旧作《大月氏西移与贵霜王国的建立》一篇，以见先生治学的风范。

父亲的这篇手稿是《文集》出版前唯一发表的学术论文，新江的《按语》也是对父亲最早的介绍和评述。

新江果然不负所托，不久，饶先生寄来了他写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序》。饶先生的序言不长，只有短短的近六百字，但立意高远，言简意赅，情深意切，充分显示了大师的风范。

饶先生的“序言”分两段，第一段写道：

孙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谋攻之要道，知胜之枢机也。治学之道，亦何以异是。西方之言学，其考论吾华文字史事者号曰汉学，以西方之人而热心究远东之事，盖彼欲有知于我，此学之涉于“知彼”者也。反观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学彼邦，略涉

藩篱，归国而后，弃同敝屣，多反而治汉学，稍为“知己”之谋，辄以兼通东西自诩，实则往往两无所知，其不每战不败者几希？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而然也。

饶先生从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理念出发，讲到治学之道，又引申到西方“汉学”的含义。由此对我国学界研究“西事”不够和不深入提出批评，指出：“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而然也。”从而强调了“知彼”之学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

接着，第二段，饶先生写道：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抗战军兴，余任教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殁谢，论者深惜之。哲嗣守诚世兄顷来书谓经已彙集先生遗书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后人，为之大喜过望。不揣固陋，略序其端，为陈“知彼”之学之重要，得先生之书以启迪来者，使人知不能以“知己”为满足，而无视于“知彼”，则不免流于一胜一负。庶几欲求操胜算者，不至于南辕而北辙，则吾文之作或不为虚，亦可稍慰先生与地下也乎。

饶先生回顾了和父亲的交往，对父亲在中西交通史上传教士的史事所做的开拓性的研究和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饶先生还认为“吾国人之能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而父亲是“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研究和了解西方的学者，饶先生也为父亲回山西后没有能够一展所学而深感惋惜。饶先生在序言结束时，仍然强调“知彼”之学的重要，认为父亲《文集》的出版有助于“沾溉后人”，“启迪来者”，了解“知彼”的重要。饶先生对父亲的评价是既深情又精准，使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特别是在十几年后，再读饶先生的序言，更加体会到饶先生眼光的博大和精深。

閻宗臨先生論藝集序

孫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而不知己，每戰必敗。」此謀攻之要道，知勝之樞機也。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西方之言學，其甚諱言華文文史事者，謂曰漢學，以西方之人而熱心於遠東之事，蓋彼固有知於我，此學之涉於知彼者也。返視吾國人之有志於究心西事者，乃寧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學彼邦，易涉藩籬，歸國而後，薰同淑慝，多近而泥漢學，稍為「知己之謀」，輒以兼通東西自翊，笑則社之兩無所知，其不每戰不敗者幾希！近世學風，流弊之甚，固之不振，非無故而然也。

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文往之史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轍者既如鳳毛麟角，其道固已出類拔萃，為士林所推重。抗戰軍興，余任報國專，自桂林播遷蒙山，後徙北流，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是輩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終未得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殞謝，讀者深惜之。哲嗣守誠世兄頃來書，謂：「鈞集先生遺著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後人。為之大喜過望，不揣固陋，異序其端，都陳知彼之學之重要，得先生著以繼來學，使人知不能以「知己」為滿足，而無視於「知彼」，^{則不免}徒得一勝一負。庶幾欲求操勝算者，不至於南轅而北轍；則吾文之作或為不虛，亦可稍慰先生于地下也乎。丙子春饒宗頤在香港。

父亲的文集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发表了好几篇书评,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春高写的《史业今生未许休——阎宗临先生的文化史研究论略》^①。黄春高在标题的脚注下写道:“我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得以‘认识’阎宗临先生。先闻先生之名,后读先生之文,再知先生之生平。乃于先生的文章道德生无限之景仰。小子不敏,率尔操觚,成此小文,为先生文集行世之鼓吹也。祈望先生泉下勿责我唐突。”黄春高在评价父亲文集时,重点介绍了父亲的文化史观和文化史研究,并指出父亲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值得今天的学术界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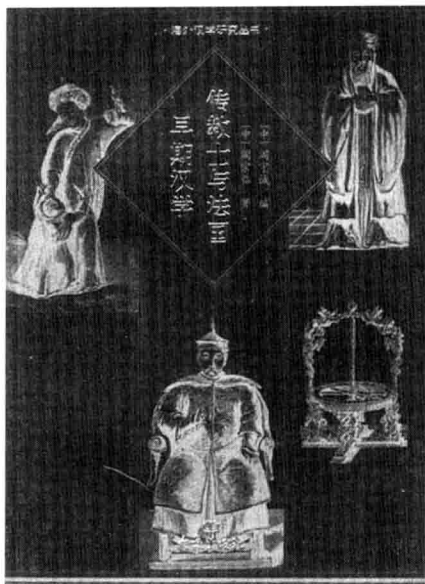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计翔翔写了《博综史料 兼通东西——〈阎宗临史学文集〉读后》^②。文章的开头写道:“导师以异常肃穆的神情向我推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并命我写一书评,以示对这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老学者及其学术成就的缅怀之情。我认真捧读再三,深受教益。”据我所知,计翔翔的导师就是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学者黄时鉴先生。计翔翔在文章中主要评价了父亲通过传教士研究对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贡献。他认为:“阎先生对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功不可没。周一良指出:‘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者当推张政烺先生’,‘以后冯承钧先生、向达先生、方豪神父、朱杰勤先生等皆有所论述,为当代所重。’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我们认为,阎宗临先生当之无愧地也占有一席之地。”

父亲文集出版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巴尔干问题,5月12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朱幼棣写的《读阎宗临的〈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文中写道:“考虑到地理历史文化上的因素,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即对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军事、历史和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预言性的成果,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山西日报》配合朱幼棣的文章,全文重新发表了父亲在1944年3月1日写的这篇文章。

我接触的看到《文集》的学者和师长,都给予《文集》很好的评价。我们系的

① 《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



《阎宗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齐世荣先生就对我说：“你父亲的《文集》很有价值，不是在欧洲生活多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你是个孝子，给父亲做这件事，比做什么都好。”戴逸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过去我知道有《身见录》这部书，但没有见过，在你父亲的《文集》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也说道：“午后归家，即展读其中西交通四篇，已如入宝山，目不暇接，倦意全消，不能释手。极感尊大人学养丰厚，故其著作精彩无比，沾溉后人，实非浅鲜。”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先生看到《文集》后，认为《文集》中关于传教士的论文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我国汉学研究史上也有学术史的意义。由于《文集》受篇幅的限制，父亲有关传教士的文章并没有全部选入，张西平建议我将父亲有关传教士的论文收集齐全，再编一本书，纳入“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于是就有了2003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2004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9月23日，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了父亲诞辰百周年的纪念会，同时，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①（以下简称《纪念文集》）。这本文集除选编了对父亲论著的

评论、他的学生的回忆及生平事迹等文章外,还收录了他写的小说《大雾》和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父亲的学生、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英为《纪念文集》写了题为《追念我的老师阎宗临先生》^②的长篇序言。孙英写道:序言“还是以回忆老师的教学为主要内容才好,这既是对老师的深切怀念和衷心感谢,也是对自己的再一次激励。”在回忆了父亲的教学之后,他总结父亲的一生有三个“不变”:一是劳动人民的品德和感情始终不变;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始终不变;三是追求知识、真理和进步的执著始终不变。我认为:这个总结是非常正确而深刻的。孙英在叙述第三个不变时写道:“这种追求是以阎先生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他少年时家庭贫困,外出求学困难重重,但阎先生还是从山村走到了北京,从中国走到了欧洲,从一个农民子弟成长为留洋博士和大学名教授,创造了人生的‘奇迹’。我想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阎先生追求不止,奋斗不息,以其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目标,达到了一个又一个境界。”

3 《阎宗临作品》

在《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出版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父亲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样的专业经历,在老一代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他的学术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因此,我想继续为他编一部三卷本的文集:第一卷为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第二卷为欧洲史,第三卷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父亲的全部学术成果就可以得到整理、保存和流传。相信这会对今天的研究者有所启迪和助益,对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是一点贡献。”^③我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已经和编《阎宗临史学文集》时不同了。当初,只是想父亲辛勤一生,写了不少论著,应该为他出本书留作纪念。在《文集·后

① 任茂棠、行龙、李书吉编:《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孙英的这篇序言,《山西日报》2004年9月7日全文发表,文字略有修改,题目为《永远怀念老师阎宗临教授》。

③ 阎守诚:《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博览群书》,2004年第2期。

记》结束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父亲的论著是他用心血浇灌、培育的花朵,这本文集,就是用这些花朵编织成的花环。我把这个花环献给父母双亲,以表达我们不尽的怀念。”从《文集》出版后的几年来,我阅读了有关的书评,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使我对父亲论著的学术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主要论著写成和发表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世界史学界成果最少的时期,父亲的研究成果显得尤其珍贵。因此,父亲的学术著作,不仅本身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的一部分论著出版,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好评,也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是我想继续把他全部论著整理出版的原因。

2007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作品》三种,即《中西交通史》、《欧洲文化史论》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这三本书大约近百万字,基本上收集齐全了父亲的全部论著,包括未发表的手稿。其中,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占百分之七十,手稿占百分之三十。至此,父亲小手提箱里的遗著基本都出版了,我整理出版父亲遗著的心愿也基本实现。屈指算来,距父亲逝世已经过去了30年。

《阎宗临作品》出版后,2007年12月1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光明日报、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等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上午,由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北京大学马克垚先生、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先生和前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做了主题发言。下午讨论,与会学者刘北成、李世安、黄春高、徐建新、王荣声、王晋新、陈志强、高毅、朱孝远、许平等都发了言。

从会议发言的情况看,与会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一致高度评价了父亲的学术贡献。